

悦书评

# “亚洲中心”与亚洲历史

——读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

文 / 余涛

以首倡“全球史观”著称的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08-1984年)曾说过：“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史的总和，若将

## 走大道 通南北

宫崎市定是公认的“东洋史”(日本学界对“中国史”的传统称呼)史学大师,京都学派(以京都大学学者为主的东洋史研究流派,与以东京大学学者为主的东京学派分庭抗礼)第二代代表人物,对中国史的诸多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及独到见解,其著作文风平易,在日本乃至中国史学界都享有相当高的声誉。

“交通史观”是宫崎市定一个重要的学术创见。在《亚洲史概说》一书中,他强调,亚洲文明因“交通”而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靠近人类文明的交通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不同区块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

比如他认为,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的西伯利亚、非洲大陆南部以及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智识”上的落后,“一方面是遗传的禀赋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排除在世界交通圈之外,缺少文化的刺激”。前半句话放在今天毫无疑问是“政治不正确”且有种族歧视之嫌,而后半句不能不说确实是学术上的

## 亚欧“中心”之争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欧洲中心论”随之大行其道。而在写作《亚洲史概说》一书时,宫崎市定明显带有“亚洲中心”的视角,可以看作是他对上述思潮的反击。

比如宫崎市定说,“欧洲文化在最初不过是亚洲文化的一个分支,希腊诸城邦的文化在发展到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之前,其动力几乎都是亚洲提供的”,

## 谁来“代言”亚洲?

在《亚洲史概说》一书初次出版四十周年(1987年)时,宫崎市定的弟子砺波护写过一篇“解说”,介绍本书著述的缘起。

原来早在1942年7月前后,日本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正在僵持不下之际,日本文部省的教学局计划编纂一本《大东亚史概说》。所谓“大东亚史”,指的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日本当局的目标是在该书完成后,立即将其翻译成东亚各国的语言,使各国民众都阅读此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数名历史学者受命执笔,宫崎市定便是其中之一。

当宫崎市定负责编写的部分刚

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巴勒克拉夫对“世界史”的定义,与同时代的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年)心目中的“亚洲史”概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宫崎看来,亚洲的“对自身历史有记录的民族或国家通过交通这一纽带,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在相互启发、相互竞争、相互援助的过程中发展至今”。

洞见。

宫崎市定将串联亚洲史的重要交通要道,分为海陆两大部分:陆路称为“北大道”,经中国、中亚、波斯通往西方,几乎与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重合;海路称为“南大道”,经中国东海、南海及印度洋到达西方,跟海上丝绸之路大体一致。在东方的中国,这两条大道由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连结成一个闭合的“循环交通”,运河的挖掘也使沿线的城市得以迅速繁荣起来,如北端的幽州(北京)、运河与黄河交汇地区的汴州(开封)等。

而交通线的变动转移,也会导致原本发达的文明衰落下去,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西南亚地区。在中世时期(日本所称的“中世时期”通常始于12世纪末的镰仓幕府,到16世纪室町幕府灭亡为止),西南亚是南北两大道的西端汇合点,是远东和欧洲贸易的中转站,虽时常有战乱干扰,但商业的繁盛从未停止过,横跨欧亚非大陆的阿拉伯帝国,即是那个时代该地区的头号强权。

“基督教信仰原本是形成于西亚的,传入欧洲后,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亚洲色彩,慢慢欧化甚至退化”。

为了强调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在谈到近代欧洲崛起的最大动力来源“工业革命”时,宫崎还略带讥讽地说:“如果当时不存在能够为各种机器提供能源和原料以及这些产品所需的市场(即亚洲),那么这些新发明都将被视为

刚完成第二稿时,已经是1944年了。第二年,日本战败投降,“大东亚共荣圈”土崩瓦解,《大东亚史概说》的撰写自然不了了之。日本战败后,社会上出现了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的风潮,文部省暗示要对有关“大东亚”的资料进行销毁,而宫崎决定抗命,坚持将写好的第二稿藏了起来,到1947年才辗转得以出版。

根据砺波护的解释,“尽管作者(指宫崎市定)执笔《大东亚史概说》时正值言论统制极为严厉的战时,其写作受到政府和文部省的直接监督,但其作品仍没有采用那种迷信皇国史观的叙述方式”。因此,他的老师这本书(包括后来增写的《续

编》)不仅在战后的日本得以公开出版,并且此后四十年间,仍能不止一次地再版。

今天的中国读者在阅读这部七十年前的“老书”的中译本时,如果能够明了上述特殊的时代背景,或许能对宫崎市定关于亚洲历史的认识 and 主张,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本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第七章“亚洲历史上的日本”是全书唯一单列成章的国别史。虽然宫崎市定一贯强调,亚洲是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的亚洲,但这样的篇章安排,多少流露出某种仿佛置身事外的视角。而这种视角的背后,不能不说潜藏着日本人在面对“亚洲”时,仍不自

然自视为新兴强权,怎么会甘心服

从于“欧洲中心论”的陈词滥调呢?于是强调亚洲的重要性,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这种欲以日本为主导力量的“亚洲中心”思潮,经一些充满野心的政客和军人操演,逐渐发酵演变,一步步走向极端,酿成了波及大半个亚洲的惨烈战争灾难,最终日本也不得不咽下自造的苦果,并为此赔上了国运。

然自视为新兴强权,怎么会甘心服从于“欧洲中心论”的陈词滥调呢?于是强调亚洲的重要性,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这种欲以日本为主导力量的“亚洲中心”思潮,经一些充满野心的政客和军人操演,逐渐发酵演变,一步步走向极端,酿成了波及大半个亚洲的惨烈战争灾难,最终日本也不得不咽下自造的苦果,并为此赔上了国运。

觉地流露出来的一丝优越感。

正如中国国家图书馆青年学者王广生在一篇研究宫崎市定“世界史观”的文章中所评价的:

“宫崎市定认为,近代日本作为汲取了东洋和西洋两大文化精华的后起之秀,在近代史上的意义,就在于成为打破这一世界体系的(虽败犹荣的)‘英雄’(第一号准白人)。他在日本‘战败’三十余年后,仍然以亚洲代言人的身份提及此事,意味深长。”

本文作者为后浪出版社历史图书编辑。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中文版,由后浪出版策划统筹,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他不认为编纂一部亚洲史,就是把中国史、印度史等亚洲各国的国别史累加在一起的“合订本”,而首次出版于1947年的《亚洲史概说》就是阐释这个观点的重要著作。



位于新疆吐鲁番以东的柏孜克里千佛洞的壁画,描绘了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唐代商人。在宫崎市定的亚洲史叙述中,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称为“北大道”,与海路的“南大道”及中国的大运河一起,共同连结形成亚洲文明的“交通圈”。

联系。

按宫崎市定的说法,一度占据世界中心、扼守东西方交通要道的奥斯曼帝国(自14世纪初起,它继阿拉伯帝国之后,以亚洲西南部的小亚细亚为中心,成为称雄欧亚非的大帝国),却因此变成了“被世界交通体系及其发展进步所抛弃的孤岛……在世界的竞争局势中逐渐落伍,并迅速地衰落”。

然自视为新兴强权,怎么会甘心服从于“欧洲中心论”的陈词滥调呢?于是强调亚洲的重要性,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这种欲以日本为主导力量的“亚洲中心”思潮,经一些充满野心的政客和军人操演,逐渐发酵演变,一步步走向极端,酿成了波及大半个亚洲的惨烈战争灾难,最终日本也不得不咽下自造的苦果,并为此赔上了国运。

觉地流露出来的一丝优越感。

正如中国国家图书馆青年学者王广生在一篇研究宫崎市定“世界史观”的文章中所评价的:

“宫崎市定认为,近代日本作为汲取了东洋和西洋两大文化精华的后起之秀,在近代史上的意义,就在于成为打破这一世界体系的(虽败犹荣的)‘英雄’(第一号准白人)。他在日本‘战败’三十余年后,仍然以亚洲代言人的身份提及此事,意味深长。”

本文作者为后浪出版社历史图书编辑。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中文版,由后浪出版策划统筹,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历史复盘

# 日本的“富国强兵”后遗症

文 / 宫崎市定 译 / 谢辰

明治初年,日本所倡导的“文明开化”带有强烈的与过去诀别的意味。那么既然抛弃了以往的旧弊,就必须明确接下来要迎接什么样的文明这样一个问题。

日本的回答是“富国强兵”。这个词今天听起来或许有些令人生厌,但在当年却是极为自然的发展趋势。因为那个年代日本周边的列强全都高举着“富国强兵”的大旗,其一贯做法就是窥伺对手的疏漏,待对方大意时就举兵而至,以捕猎食物。而对于日本来说,还有一个格外沉重的负担,即日本人乃是亚洲人这一事实。

即便到了今日,种族偏见也仍然存在,但如今的年轻人已出生在不必为肤色所苦的幸福境遇之中。然而,上个世纪(指19世纪)中叶的情况还并非如此。当时的日本人对世界上的不合理风潮,是赌上了性命与之拼死一战的。那些没有与欧美发生过战争的国家,对于这一点似乎是无法理解的。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确立了近代化的国策,在其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之际,作为近邻的中国、朝鲜却依然处于低迷的旧态。面对这一现实,日本人采取的是怎样的态度呢?似乎日本也会像欧美诸国一样,趁邻国暴露弱点之机而采取侵略的政策,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最初,日本人认为近邻都是亚洲人,故抱有同为亚洲人的同类意识,因此希望各国共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然而日本最终转而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这一过程中最大的转折点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其次就是日俄战争。

如果对两次战争进行比较,对于日本来说,最危险的赌博行为是甲午战争,而非日俄战争。毕竟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状态,连一个友国都没有。然而,中日开战后,清朝实力之弱令日本人颇感震惊。日本人从此意识到,亚洲对于日本毫无益处,并对近代化有了更强的信心。此后,日本便开始加速推进“富国强兵”之策。随着近代化的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忘了自身是一个亚洲国家,而开始希望获得与白人国家一样的待遇。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这一倾向得到了进一步的滋长。

日俄战争基本上是在经过精打细算之后展开的,且在外交上,日本拥有英日同盟这个依靠,美国也对日本抱有同情。但即便如此,战争开始之后,日本仍然饱受高额的军费之苦,只能靠各国的借款来解决军费问题。为日本提

供资金的英美等国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日本战败而收不回利息,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并不希望日本变得过于强大。所以对日本当局来说,在何种时机与俄国讲和,是最需要动脑筋的地方。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日俄战争自始至终都处于英国人的指挥之下,且完全是为英国的利益服务。事实上,英国在中国是最大的权益拥有者,通过这次日俄战争,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变得愈发稳固。对于清朝来说,俄国的南下才是最大的威胁。所以,无论日俄战争的胜败如何,清朝都有可能关键时请求英国援助,借以对抗俄国。

英日同盟可以说就像主人与仆从之间的同盟,但仆从在捡拾其作为仆从的利益的同时,也逐渐不再满足于这些既得的利益,并开设考虑独立,而事情也因此变得麻烦起来。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一脚踢开了美国试图经营南满铁路的提案,日美关系也因此迅速转冷。日本在对美国心怀戒备的同时,与俄国一同将中国东北地区分为南、北两部分,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以实现和平。

日本以往出于战争目的而整顿军备时,主要从英国购买军舰,所以日本海军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英国造舰技术的胜利。不过,随着日本建立了一定程度的重工业,政府开始使用国产军舰,而不再向英国购买军舰,此举最终激怒了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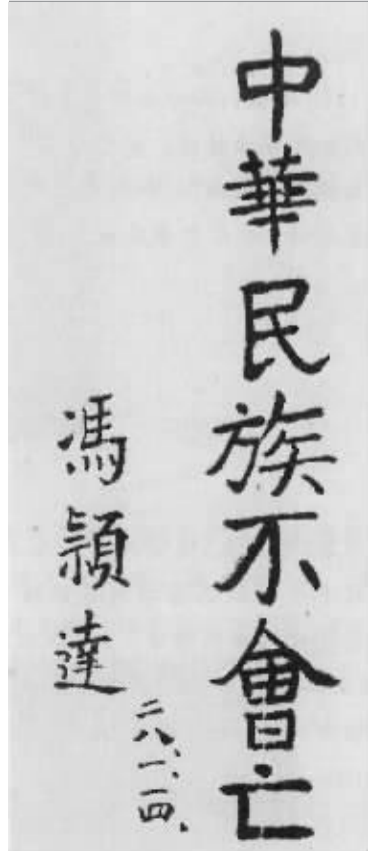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向德国宣战,并占领了胶州湾,然而英国却对此横插一脚。因为在英国看来,日本一旦由此变得强势,英国的利益就不得不相应地分给日本。结果,日本只得到了位于赤道以北的太平洋上几乎毫无用处的小岛,有价值的部分都为英国所独占。而且,由于战争局势的意外延长,英国还要求日本海军到欧洲海域协助英军作战,甚至进一步要求日本陆军参与英军的东部战线,尽管这一要求并没有实现。

追求富国强兵乃是新兴民族都必然会经历的阶段,也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在日本,富国强兵的目标在明治、大正年间(1868-1926年)基本得以实现,但同时也随之出现了非常危险的后遗症。从世界角度来看,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国家在战后必然会发生的现象,即军人崇拜和军事优先,以及对本国常胜不败的普遍信仰。

这种难缠的信仰一旦确立,便会一直持续到实际战败的那一天。

本文节选自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中文版第八章“现代亚洲史”,译者为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在读博士。标题为编者所拟。

上接《E1



1939年初,《儿童世界》杂志上刊出的儿童冯颖达书法“中华民族不会亡”。

# “中华民族复兴”百年回响

“在苦难中复兴!”

“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广泛流播,又可谓是对日抗战那个特定时代里,国人需要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心理和精神新望的强烈体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复兴”论迅速达到高潮,随即流行于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除国民党之外,最热心于“中华民族复兴”论的政党,莫过于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了。该党诞生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不久的1932年,它刚一成立,就创办了著名的《再生》杂志(该杂志英文名直译为“民族文艺复兴”),以再造中华民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

以早年的“东方文化派”骨干张君勱为党魁的国社党,在建国思想上,有别于国共。它希望通过“修正的民主政治”,“国家计划的经济”,铲除官僚资本,进行恰当的土地改革,实施普及教育、学术

独立和思想自由等政策,在国共之间、美苏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走出一条独特的中间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客观地说,国社党的有关论说,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高涨,也体现了这一思潮的思想高度、精神强度和时代品格。

显而易见,作为一种时代思潮,“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发生和演化,与民国时期各政党诉求之间的彼此互动,是长期存在的,也可以说它不得不打上了民国政党话语政治的深深印记。但那时候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又有超越政党政治的重要面向,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它是那样的众说纷纭、复杂多彩,凝聚着亿万国

人渴望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奋斗意志与生存信念。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广泛流播,又可谓是对那个特定时代里,国人需要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心理和精神新望的强烈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更成为激扬士气、焕发军民民族血性、勉励官兵焦土抗战的精神支柱之一。如爱国将领李宗仁1938年出版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书,在抗战军民中就影响极大,甚至有某种象征意义。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军人本身民族自觉的主观意识勃发,加上蒋介石国民政府以“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在军队

中进行的抗战思想动员,收到一定成效,使得国军中也涌现出了众多具备民族气节、勇于慷慨赴义的军官和士兵。

与此相呼应的是,一种传统的“多难兴邦”论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中自觉复活,并切实发挥着社会效力。这在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后流行的一首歌曲《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由当时著名海派作家曾今可所作的歌词写道:

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复兴 / 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前进 / 那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遭受过苦难 / 那一个伟大的民族没有经过过战争!

苦难使我们的国家进步 / 战争使我们的民族年青 / 在我们的心中

充满着希望 / 在我们的眼前充满着光明。

谁说这国家到了危亡的时候 / 谁说这民族到了衰老的年龄?! / 看吧,伟大的中华民族已经在苦难中复兴!

作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和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是国内“新文化史”和“概念史”研究有影响的探索者之一。著有《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她”字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主编《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等多种丛书及文集。其新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2017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